



两个同学的通信

〔苏〕 阿列克辛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 阿列克辛

两个同学的通信

昌 茂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插图：石一翎

封面设计：芦 勇

责任编辑：李肖波

两个同学的通信 [苏]阿列克辛著 昌茂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插页2 字数79,000 印数00,001—30,2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8·19

定 价：0.38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群纯洁、真诚、可爱的孩子。为帮助居住条件困难的管衣女工得到一套住房，同个人主义者进行了一场巧妙而机智的斗争；为让九岁的小季莫什卡不失去友爱的温暖，他们煞费苦心，干出了一桩桩秘密的、令人发笑又使人感动的事情……读读这本书吧，它会告诉你什么叫同情心，什么叫友谊，什么叫做正义感……

作者简介

阿纳托里·格奥尔基耶维奇·阿列克辛是苏联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一九二四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家庭，一九五〇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一九四五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〇年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

阿列克辛的作品不仅反映了青少年的生活、学习、理想和情操，而且广泛涉及到苏联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风尚、学校教育、家庭生活以及道德伦理等问题。

阿列克辛对青少年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描写细腻，抒情朴素，文笔简练幽默，富于生活气息，作品结构紧凑，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颇具独特的风格。有人说，他的作品即使不署名，也能被人一眼认出。

阿列克辛的作品朴素无华，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豪言壮语，却能使青少年一代通过书中

情节的潜移默化受到自我修养、助人为乐、分辨是非美丑等教育。因此，他的作品不仅青少年爱不释手，也为成年读者，尤其是教育工作者所普遍喜爱。

作者常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中篇小说，按篇幅而定勿宁说是较长的短篇小说，但苏联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却认为，他的作品就其包含的内容而论，倒应说是长篇小说。由此亦可见阿列克辛作品内容丰富多彩之一斑。

阿列克辛曾获苏联国家奖金、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奖金、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奖金，荣获两枚劳动红旗勋章及克鲁普斯卡娅荣誉奖章。他还被授予国际安徒生奖状，两次列名于以这位伟大丹麦作家命名的荣誉作家名单之中。

译者

1983. 8

奥丽娅和科利亚

“公正”——这是常挂在奥丽娅嘴边的一个词儿。不错，她常常要给这个词儿添上短短的否定词“不，这不公正！”——她常用自己那副深沉、唱歌似的嗓音安详地说，并马上为争取公正的胜利而去进行斗争。

女孩子们都爱奥丽娅·沃龙涅茨。去年夏天奥丽娅留着两条辫子——她女友的头发上也都有五颜六色的彩带在闪动。今年春天去夏令营之前，她剪了短发——她的女友们都一下子毫不可惜地割舍了自己的辫子。奥丽娅稍微有点口吃，女孩子们于是也开始在某些词语上把元音字母稍稍拖长，优雅地结结巴巴打奔儿，象奥丽娅做的那样。

奥丽娅很少生气。主要是路见不平的时候才生气，——女孩子们于是也都尽量要当个极有原则的人。

当有人说她漂亮的时候，她也生气，有时甚至会突然发起火来。去年，少先营主任领着一个代表团在“松林”到处参观，不断地高声说：“这是我们的排球场！这是我们的阅览室！这是我们的广播站！……”

“这是我们的美人儿！”他从远处看到奥丽娅·沃龙涅茨的时候骄傲地宣称。

代表团团员们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响起来，不过，底片上留下的怕是只有奥丽娅的后脑勺，因为这个女孩子听到主任的话竟然不礼貌地对来宾们背转过身去，消失在树后。

八月初，夏令营里的情绪变糟了：大家得知，九月的第一天奥丽娅将不来上学了，她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她父亲是位地质学家。他在乌拉尔找到了铝厂所需的矿床，如今要到北方、到北极圈里去探寻什么了。

奥丽娅即将远离，夏令营里只有一个人高兴——这是科利亚·涅兹洛宾，外号叫科利卡·小口哨。他爱同鸟儿们说话。跟同学们说话又短又粗：“喂，你！……我跟你说话！”——同鸟儿却谈得很温柔，能够毫无错误地分辨出它们的啼鸣。

不过，叫他外号小口哨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有一次，是去年，他突然意想不到地答应大家，要在家长会那天以前写出一首好诗，结果却写出了一首坏诗，以致不得不用一篇散文来欢迎家长。其实，除了奥丽娅·沃龙涅茨，谁也没见过那首诗。本来应该由她在文娱晚会上朗诵

这首诗的，但她在最后一刻却拒绝朗诵了，说这首诗根本不行。

奥丽娅首先找到科利卡说：“唉，你呀，小口哨！……”科利卡则回称她为小乌鸦^①；这好象是唯一不被他喜欢的一种鸟了。



除了科利卡，谁也不把奥丽娅叫做小乌鸦，而小口哨这个外号却牢牢粘在他的身上，好象他一生下来就写进了他的出生证。

在夏令营广播站组织的各种辩论中，主任最喜欢题为“男孩子可不可以跟女孩子要好”这个辩论。尽管大家早就清楚，男孩子可以跟女孩子要好，他还是每年夏天都组织以此为题的讨论。今年，这个辩论一下子就无声无息了，因为引不起争论来。夏令营主任于是让科利卡·小口哨上了麦克风，而科利卡·小口哨则宣称，女孩子都是叛徒。

女孩子们都明白他指的是谁，于是连忙跑来替奥丽娅

① 沃龙涅茨这个姓是由俄语“乌鸦”一词变来的。

说话：“你呀，这个闷声不吭的家伙，这回说了个够！……把话讲出来啦！”女孩子们在广播上嘁嘁喳喳地说。只要把麦克风一开一关，辩论就空前热烈地进行起来。

科利卡却什么也不回答。他又沉着脸一声不吭了。有的人认为，他喜欢同鸟雀交谈，只是因为他同人们没什么可说。而实际上，只要他想谈，他还是有不少话可说的。

他能说的是……

父亲设计了好多铝厂，不过，厂房耸立起来了，而砖墙上、房顶上、烟囱上都没有标明这里也有他父亲的一份劳动。再说，人家根本不让科利卡的朋友们进入厂区，他们也就没法确信他父亲从事的是一项巨大的、艰难的劳动。而科利卡的妈妈却是尽人皆知。离开她，院子里的排球队就不能同敌手搏斗，这一点，从科利卡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了。

谁都不称呼科利卡妈妈的名字和父称。所有的人，甚至连孩子，都只称她廖丽娅。“等我们的廖丽娅下了班，我们让你们瞧瞧厉害！”——他们对邻院的排球队员喊道。科利卡很自豪，仿佛是他自己会扣得让网子那边的球员都胆战心惊地蹲下来，仿佛是他自己把球“传得”那么好，让球急剧地、象个黑铅球似的离网只有几毫米飞过

去，奇迹般地没有碰网。

妈妈总穿着瘦窄的运动裤和短袖汗衫跑到院子里。球迷们总用洋洋得意的哄叫声欢迎她，然而她每次都首先寻找科利卡，把他放到观众席的最前排：让他坐到院里的长凳上或者直接坐到草地上……科利卡于是就谦虚地、严厉地、不表示欢欣地坐在那里，只是偶尔同妈妈交换一下眼色。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是在遥远的北方城市。科利卡早已离开了那里，但那一切情景他都记得很清楚，并且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掉……

父亲比妈妈年长好多。他不象妈妈那样，会打排球，会用古怪的蝶式游泳，会迅速而又轻巧地滑雪。妈妈并不勉强他学习这些。但是她却让爸爸也学会了穿着翻领运动衫走来走去，睡前长时间散步和早晨做操。她天天一下子把三块小地毯拖到屋子中间——一块给自己，一块给父亲，一块很小很小的给科利卡。

她还教会父亲当排球赛的裁判。每当父亲嘴里叼着哨子从侧面坐到球网旁的时候，科利卡就觉得，也许别的人也都觉得他完全是个年轻人。在这种时刻里，大家也很想随随便便地称呼他的名字……不过，终于没有人这样称呼他。

但是大家却跟着妈妈尊敬地称他为：“噢，最最公正的裁判！”对运动员来说，爸爸的哨音就是法律。在排球搏斗或是傍晚散步后回家的时候，父亲常对妈妈说：“我又

感到呼吸轻松了……又轻松啦！”这对父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患有慢性哮喘病。

在家里当裁判的却是妈妈。她从来不大声吹哨，从来不用言语提醒生活中的规则，但父亲和科利卡总是愉快地、自愿地服从她的裁决，因为这些裁决是正直的。妈妈也经常说：“这是公正的！”科利卡所以生奥丽娅·沃龙涅茨的气，也还因为他觉得她似乎是把妈妈心爱的字眼占为己有了。

妈妈在幼儿园当保育员。科利卡就在她那个班里。妈妈对其余十五个小家伙象对他一样那么关心，也许更为关心，这有时也使他感到生气。有一次他因为这个而大哭起来。妈妈把他高高举起，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说：“我没有比你更亲的人。以后也不会有。你要记住这一点。”科利卡放了心。也记住了。

他在幼儿园里不止一次听到当妈妈的向院长恳求说：“把孩子们调到廖丽娅的班上去吧。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可爱……”人们把妈妈称作善良的，这很令人高兴。但是科利卡却不喜欢“可爱”这个字眼，因为他不懂得这个字眼不是指妈妈，而只是指她的面孔——少年似的、调皮的面孔。

有一年夏天，反复发作的哮喘病使父亲憋得喘不过气来。这遥远的北方城市的气候成了爸爸的疾病的同盟军。

“我带你去找最好的医生，去找河流、去找清新的空气……它们会把你治好的！”妈妈说，“咱们钻到荒无人

烟的地方去，象鲁滨孙似的生活！”

他们三个人乘火车，接着坐载重汽车，然后又徒步走了一小段——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这里的空气是干燥的，而自然环境恰恰是多年来医生所建议的。医生们总是一边建议一边说：“不过，这一切当然只是无法达到的理想。所以咱们最好还是求助于药片和药水吧！”

医生们不认识妈妈，不知道她善于把父亲和科利卡需要的一切全都变成“有法达到的”。

从前在家里的時候，每到傍晚妈妈下班一回家，一切就都马上变了样：饥饿消除了，房间舒适洁净了……妈妈要是耽搁了，科利卡和父亲就觉得自己好象没有了着落，仿佛是待在车站上等候一列误了点、而又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来的火车。

那是在家里，在城里的住宅中的事……而在这里，在河边上，妈妈突然表现出科利卡和父亲连想都没有想到的那种才能。每天早晨父亲都要给这即将开始的休息日做计划，妈妈却哈哈笑着说：“咳，你呀，设计专家！真是我的不可救药的理论家呀！……”她于是在护林员的小房里生着炉子，要不就直接在森林里点起篝火，熬汤、煮土豆、烧牛奶……

父亲面色红润起来，不再吃药了。“咱们现在是三勇士啦！”妈妈常这样说。可是有一天傍晚，她侧身躺下，脸色苍白，看到科利卡那害怕的面孔，她不知怎的很不自然地、非常勉强地笑了笑。科利卡突然觉得，“大地从脚

下滑走”这句成语既不是杜撰，也不是夸张，因为他焦急得两腿发软，感觉不到身下还有坚实的木头地板。

上了些年纪的护林员、父亲和科利卡用帆布雨衣做成担架抬着妈妈向五公里外的一个村子走去，因为连马车都无法走近护林员的小房。妈妈一直拉着科利卡的手（不是拉着父亲，不是拉着护林员，而只是拉着他，——科利卡永远记住了这一点）。她不时地，也许几乎是不省人事地反复说：“不要紧……请你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她只是偶尔问一句：“还得走很久吗？还很久吗？……”而他们，他们三个人，都不作声。

科利卡在想，父亲病重的时候总象个孩子似的张皇失措，好象想把自己受的折磨转给身边的人，或者是哪怕同他们分担一点自己的病痛也好；而妈妈却一直力图从身边的人肩上卸下重担，消除他们的恐惧，“请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森林里天色很快就黑了。路很难走。不久以前还显得如此诱人的一切——难以通行的灌木丛、密密麻麻纠缠在一起的树枝，——科利卡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怀有敌意和仇恨。“还得走很久吗？还很久吗？……”妈妈不时问着。

他们从村子里给二十五公里外的区中心，给医院打了电话。急救车从区中心来到这里走了好长好长时间，虽然从表上看，它总共才行驶了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身穿白大褂、很不爱说话的年轻人甚至没跟别人问好就马上开始给妈妈检查。随后短短说了一句：“阑尾

炎”。他在登上那辆前面的圆灯上画着红十字的白色汽车时又说了几个字：“得赶紧才行”。父亲也上了汽车。汽车飞驶而去。科利卡甚至没有想到让他们把自己也带上。

他同上了些年纪的护林员并排站在村苏维埃附近，心中一遍又一遍默念着妈妈最后说的话，不是对父亲说



的，不是对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说的，不是对上了些年纪的护林员说的，而只是对他、对科利卡、对他一个人说的：

“一切都会好的。阑尾炎——这不算什么。这种病死不了人……”

妈妈死了。这是很久以前，是科利卡刚刚准备上学听第一堂课那年的事。现在他已经上六年级了……

好几年过去了。科利卡却一天都没有忘记那个严厉的、身穿白大褂的年轻人和那句简短的话：“得赶紧才

行”。他们究竟为什么没有来得及呢？……

科利卡有了一个奇怪的、人们不能理解的习惯——他几乎对每一个新认识的人都要问：“您得过阑尾炎吗？”

“得过，”人家对他说，“割掉了。那不算什么！”
于是，依旧是那个萦回不去的想法又一次揪着心：
“医院要是离得近一些呢？森林里的路要是好走一些呢？”他于是又听见了妈妈的声音：“我没有比你更亲的人。以后也不会有。”

那个遥远的、开始时如此无忧无虑的夏天纠缠不已地呈现在他的眼前，怎么也不愿变成回忆……

在老橡树旁

少先营主任非常喜欢接待代表团。在这种时候，天气不论多么炎热，他也穿着深色西装，系着领带，出现在闷人的树林里。他象参观向导似的，向前伸着食指，一边走着一边解释说，亭子叫什么亭子，图书馆叫什么图书馆；迎面遇上孩子，他都要拍拍他们的肩膀，而平常日子同他们打招呼都很勉强；他还用深切关心一切的亲爸爸的口气前言不搭后语地提着问题：“喏，排队集合进行得怎么样啊？营委会上谈了些什么呀？”

“排队集合”和“营委会”——这是他记熟了的、为

数不多的少先队术语。孩子们几乎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和父称，都直接把他叫作“主任”。他似乎坚信，少先营之所以存在，主要就是为了可以给检查组和旅游者参观。

奥丽娅不喜欢少先营主任。有一天，建筑委员会的领导看完了少先营的全部设施，主任疲倦地说完他那句心爱的话：“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而领导感激地对他说：“你们生活得很好嘛！”这时候，奥丽娅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插嘴说：

“这一切全是费里克斯做的！”

“是谁，是谁？”领导为了强调自己特别注意“儿童的呼声”而感兴趣地问道，“是少先队员吗？他姓什么哪？”

“不，这是主任辅导员，费里克斯！我们不称呼他的姓。”

主任的脸白了，而领导则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什么。那个本子的封面上烫着金字：“赠给工会会议代表”。

费里克斯也不喜欢主任，他所以到少先营来工作是因为不愿意整整一夏天离开孩子们。他和这些孩子接触已经三年多了：他在他们的学校里当主任辅导员。再说，他还必须额外挣些钱。

“这是生活中的抒情诗与散文的有机结合。”他说。

费里克斯小时候在克里米亚碰上了地雷，失去了右臂。

“这是战争的回声！”他抚摩着吊在腰带下的空袖筒